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 (第三辑)

上海沦陷时期 《女声》杂志研究



涂晓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第三辑)

上海沦陷时期 《女声》杂志研究

● 涂晓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涂晓华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57-0647-9

I. ①上… II. ①涂… III. ①女性读物—期刊—研究—上海市—现代
IV. ①D44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025 号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

著 者 涂晓华
责任编辑 赵丽华
责任印制 张 珩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647-9/D·0647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涂晓华博士著作序文

严绍澍

涂晓华博士大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新闻史(包括杂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个案,著者以高度的人文理性精神和切实的文本实证观念,在特定时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为揭示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本书研讨的是一种杂志的属性)提供了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范本。

《女声》杂志是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在当地编辑出版的一份中文杂志,起自 1942 年 5 月,终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该刊由日本海军部出资,当然引起研究者对它的高度注意。由于这一显露的“政治性”特征,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在关于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研究中,研究者据此皆指认它为“汉奸刊物”。“汉奸”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定性短语,其严重性远远超越诸如“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我们民族在生死搏斗中崛起,对于“汉奸”的仇恨构成民族情感的重要层面。一旦被认定为“汉奸”,很少再会有人去考虑乃至去研究“真的是汉奸吗?”“为什么会成为汉奸?”“这个汉奸究竟做了哪些汉奸的事情呢?”。

本书即是涂晓华博士对这样一份杂志的研究,即对这份被称名为“汉奸”的杂志进行重新审视。我们阅读晓华博士全书可以明白,这是作者从总体上致力于揭示与解析在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华进行全面战争中的“文化战略”研究与阐述我国近代新闻杂志史所呈现的极为复杂的发展状态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研究,称之为“如履薄冰”并不言过其实。涂晓华博士

并没有匆匆地对《女声》的性质做出结论,全书以解析《女声》杂志出刊的“文化语境”开始,引导关注这一刊物的整体性特征,以理性精神作为统摄思考的基础。我阅读本书,感觉作者好比一位法官面对一个准备“复审”的大案子,案情相当复杂,审判者此时的心态当是肃静且镇定,她在高度的理性精神中查寻本案最确切的证据,同时也寻查需要证明“确切证据”是“确切”的一系列多层面的“证据链”。

人文学术研究中长期的模式化思维训练,造成了不少研究的表述经常深陷在“二元对立”的自我封闭中。但是实际生活比“二元对立”的思维要复杂得多,造成我们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多形态的判断常常陷入“失真”的状态中。

本书著者具有明确的“特定时空”中“多元文化语境”的视域。我体会作者是在三个层面中“复合立体”地观察与考查了这一杂志所具有的文化本质意义。

第一层面文化语境即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对中国、东亚,以及整个亚洲与太平洋的狂妄的侵略战争中,逐步完成了与此相应的“文化战略”。在它的总体战略框架中,依据军事占领与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区域的复杂性,分别推行了形态并不相同的“文化策略”。例如,在我国东北地区以伪“满洲国”为依托的所谓“五族协和”,在我国台湾地区推行所谓的“皇民化”,在华北地区推行所谓的“政体自治”,在上海地区试图推行他们所谓的“国际化”等等,成为《女声》杂志出刊的“特定时空”中的“文化语境”之一。

上海自19世纪40年代由英国殖民势力入侵以来,逐渐发展为各殖民主义国家在东亚扩展其“殖民势力”的集散地,也是我国近代“口岸知识分子”的主要起源地。20世纪初期首发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很快便转移于此,上海成为我国各类知识阶层与国际多元文化潮流相互撞击与汇合之所。在日本觊觎中国全土的战略野心中,上海既是它的“必得之地”,同时也是它展现“亚洲解放论”的“展览之地”,成为《女声》杂志出刊的“特定时空”中的“文化语境”之二。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全民族的抗战中,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种抗日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集团多种力量和组织相互交手的最秘密的战场,这个城市中活跃着多种情报和秘密工作者,他们以各种面貌出现于各种层面中,不仅收集情报,而且向相应层面的民众

渗透相应的精神和思想。这样的“文化语境”成为《女声》杂志出刊“特定时空”中的“文化语境”之三。

研究者以这样的“复眼”对《女声》杂志进行的考察确实是前人在对这一份杂志做出“政治性质判决”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的“当时真实的现实”，因而他们的表述也就失却了对这一杂志的政治与文化本质性意义作出比较符合真实判断的前提。

上述三个文化语境恰好构成本书著者考查《女声》价值的基点。以这样的基点为观察的视域，全书集中以“原典实证”作为研讨杂志价值的所有问题的依据。所谓“所有问题”，我体验本书对这一杂志政治文化性质的论断，则是集中在五个层面中，此即杂志出资方、杂志主编的身份、杂志的真正运作者、杂志文稿的作者群体、杂志刊发的文稿的精神与文化状态。

作者在上述一系列的实证表述中又相对集中地对涉及本课题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人士即主编田村俊子从日本的左翼作家到在上海沦陷时期出任《女声》主编，以及《女声》杂志最重要的主持编务的女共产党员关露身处险境的思想历程和文学历程做了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研讨，并由此而扩展到对日本侵略者占据上海时期的文艺界复杂的状况，以及多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公开的与隐性的冲突，进行了必要整理和辨析，从而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中揭示了殖民地内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多元抗衡的复杂性特征。

我在阅读本书时对著者在上述各个层面中所出示的“原典材料”十分钦佩。《女声》杂志的内部成员由于特定时空中的多元文化语境创造出超乎常人想象的奇妙、严肃、紧张的组成——由于主编田村俊子深知自己对中国上海的“无知”，邀请上海的女作家关露参与主持编务；由于关露是一位在廖承志、潘汉年领导下潜伏于上海活动的中共成员，她以自己敏锐的眼光从读者来稿中发掘了以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等为核心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女声》杂志的主要作者群体，尽管直到新中国成立关露与丁景唐才互相了解对方的政治身份。《女声》作者群体中爱国抗日的精神特征，致使这一由日本海军部出资的杂志较少刊发呼应或宣传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文稿，虽然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激烈的呼声，但确实把一个军国主义军部的刊物演变为一份“女性生活”

杂志以抵消侵略者的叫嚣,符合在上海这样的区域从事“抗日救国总体战略”的一个层面。

著者对《女声》杂志这样精微确切的把握,是与著者的理性思维的养成以及知识量的丰厚密切相关的。我与著者相识时间已经很长,见证她在为本课题的解析在国内和日本为调查和收集相关的外文原始材料,以及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谈话和实地考察等等所付出的辛劳,由此而积累的文档,不仅为本主题研究提供了前人所未见的材料,而且无疑具有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日后不能再得的抢救性价值。我们在本书的阅读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体验。

涂晓华博士在本书中就《女声》杂志的“实况”进行的研讨和做出的结论性判断,给我教益是至为深刻的。她以“特定时空”中的“多元文化语境”作为观察一切迷离扑朔现象的基本视域,以“原典实证”作为解析与结论的基本立场。从而,本书对这样一个尖锐复杂的课题的解析和判断具有真实性和确证性,也即以确切的“证据”以及相应组成的“证据链”,揭示与阐述了处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刊发的这一份特定杂志的事实本相,并由这样的事实本相引导出它的基本的文化价值属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如我开始所说的,本书所具有的科学性价值可以作为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广泛的层面中处理复杂迷离的研究对象的一种“范式”。

由于我已先期读到了涂晓华博士的这一著作,她嘱我为本书的正式刊发写一个序言,惶惶中就以自己阅读的感悟写了上面这些感想,希望与阅读者交换心得。假如我们能够在涂晓华博士的著作中从对一份杂志的政治倾向与文化价值研究中获得对相关的人文学术课题研究中应有的基本“观察视域”与“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启示,我想这就是我们对著者数年辛劳最好的慰藉了。

2013 年 12 月撰写于北京大学蓝旗营跬步斋

严绍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研究重点基地)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制度殖民场域里的《女声》与后殖民语境中的《女声》研究

——写在涂晓华博士论文出版之际

张 泉

一、历史研究的悖论与魅力

我们对于历史研究的预期，是探寻过往年代里的人物、事件乃至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样貌。

不过，实际发生的历史即第一历史，其全部的丰富性与时间成反比，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后来者难以知晓全貌。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谓第二历史，即史学家根据实物遗存和文献传说构造出来的历史。在不同的史学家那里，这样的历史受到材料、社会环境和治史者主观品格的制约，往往会形成有所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叙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须臾懈怠。

就像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一样，尽管我们无法回到第一历史，却可以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持续的累积让第二历史尽可能接近真相。永远达不到、却存在着几近到达的无限可能性——这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职责乃至魅力所在，也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对已经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女声》杂志兴趣盎然的原因所在。

二、《女声》杂志的特殊性

《女声》既是研究民国史、抗战史、沦陷区文化与文学史、中日现代文化交流史、女性(女权主义)史的材料,也是上海沦陷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它不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影响广泛的刊物,却在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中国现当代史中独树一帜。

《女声》的基本情况如下:

出版地:上海

刊行时段: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总计38期)

出版资助方:日本驻南京伪政权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

主编:左俊芝(第1至第36期)、关露(第37、38期)

进一步细究,《女声》还有以下特点:综合期刊;女性读物;主编均为女性、新文学作家、左翼作家;前期主编左俊芝是日本人(原名田村俊子、佐藤俊子)、后期主编关露是中共人员。

有鉴于此,在研究这份杂志时,“女性编辑的女性杂志”、“日本占领区定期出版物”、“上海沦陷期官办期刊”、“日中人士共同编辑”、“中共上海地下党”等定性语汇,成为无法绕过的关键词——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影响对《女声》的阐释,特别是其中的“上海沦陷期官办期刊”这一条。这也是为什么在漫漫40余年之后,《女声》才被人们重新提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战后同时代人以及学者对于《女声》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1986年,民国时期期刊从业人员王伊蔚首次论及沦陷区杂志《女声》。她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后,突然出现了日本人兜售的《女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

这种伪《女声》的开本大小和编排形式,不仅与我们办的《女声》相同,甚至连封面设计的“女声”两字都与我们的一样。伪《女声》的主编

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吴露”的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①

1932年10月至1935年下半年,王伊蔚曾在上海主编同名杂志《女声》。抗战胜利后,她又恢复出版(1945年11月1日),一直坚持到1947年。

复刊时,王伊蔚首先严词声讨沦陷期的“伪《女声》”杂志和“文化汉奸”关露,以宣示她主编的《女声》杂志的道统。另一方面,却约请沦陷期成名的女作家苏青、潘柳黛为光复期的《女声》撰稿。也就是说,把中共情报人员误作附逆作家加以揭露,却聘用当年与日伪上层联系密切的新进流行作家为复刊后的《女声》增色。这表明,即使是民国时期上海传媒界的在场者,也无力明察身在其中的真相。在很多时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1988年,《一个女作家的遭遇:记关露的一生》出版。该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关露任职《女声》的原委。1942春,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老张向关露交代新任务时说:

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了一个妇女刊物,叫《女声》月刊,需要找一个中国编辑。我们派你去干这个工作。这个月刊社的社长是日本人,名字叫佐藤俊子。她曾在加拿大住过十几年,在那里的知识青年中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因此她有一些日本的左派朋友。现在派你到《女声》社去工作的目的,是希望你能找到佐藤的左派朋友,想办法找到日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们搞到敌人的情报。

老张又说:

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物质条件去和敌人作斗争,要穿上敌人的衣服干革命工作。你到了那儿,要认真工作,当好编辑,要让他们信任你,

^① 王伊蔚:《回忆〈女声〉杂志》,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这一段话所表达的意思,与作者当年在复刊号上的评价基本相同,只是把关露改作“吴露”了。见伊蔚:《编者的话》,《女声》复刊号(1945年11月1日),第30页。

不要暴露自己,要耐心坚持,守好阵地。

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尤其是这种特殊性质的工作,付出多少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是靠我们主观上的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驻守阵地,等待时机……^①

在关露孑然一身的凄凉晚年,该书作者之一萧阳曾对她做过系统的采访,并为重印她的旧作而四处奔波。上文可视为关露本人的自述。

不过,事实是,在《女声》杂志社任职三年多的时间里,关露一直未能等到为中共搞日本情报的机会,而是正常地编稿、写稿、参加社会文化活动,被许多人视为由左翼转向的“汉奸”,没有“暴露自己”。关露的人生悲剧在战后:她的这段经历在中共体制内反而成了被整肃、遭监禁的依据,直到1982年3月23日,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一纸《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彻底抹去了这一困扰她后半生的个人历史污点。^②因关露获得平反,学术界对于《女声》杂志以及田村俊子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1993年,学者吕元明在论述日本文学史中的田村俊子以及《女声》和关露时,就有了不同评价:田村俊子“对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幸是同情的,她希望通过其晚年而有贡献于中国。中国通过关露,认识了田村俊子,也接受了她的好意。田村俊子不大可能知道自己在为中国抗日的特工提供条件,但她的杂志确实为抗日的活动作过贡献。她在中日刀兵相见的时刻和关露结为密切朋友,因而也可以说她是中国人民抗战中的朋友。”^③

由于缺少证明环节,上述判断难以突破猜想的范畴。对外扩张时期特别是二战时期,日本举国陷入军国主义狂热,左翼知识分子纷纷“转向”,文学家几乎悉数被编入“战争协力者”行列。特定时期的田村俊子,也没有置身局外。把她

① 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遭遇:记关露的一生》,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② 关露(1907—1982),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女诗人。对于她悲剧一生的扼要叙述,参见张泉:《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内容与性质之辩——试析几篇“商榷”文章中的史实差错》,收入张泉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289页。

③ 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特别与“抗日”、“抗战”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在殖民/反殖民国家对抗的层面上将其拔高了。至少,《女声》同时代人王伊蔚对于“伪《女声》”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田村俊子的《女声》主编生涯,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让沦陷区的中国文化人体察出其反对日本侵华、支持中国抗日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

田村俊子(1884-1945),是享誉日本现代文坛的早期职业作家。后离开日本,赴北美侨居18年。1936年返回日本时,已游离于日本主流文坛,加之丈夫病逝后情感空白,进入人生的潦倒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的战场迅速扩大,日本文人被一批批派往中国内地进行战地报道,为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服务。1938年12月,田村俊子也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的身份加入“笔部队”行列。在华采访两个月的任务结束后,她没有按期返回日本,而是在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杭州、镇江、北京等日本占领区旅行,寻找就业机会,直到1942年58岁时,才在上海找到编辑《女声》杂志的工作,得以摆脱生活困顿的处境。^①田村俊子只是在上海得到一份工作,在认真编辑一份“充满了纯粹的,文化的编辑意图”的女性杂志。^②她在《女声》中坚持改善妇女地位、改进劳动者生活的一贯主张,与她战时的日本立场并不矛盾:她认为“日本为新日本建设而战,为新东亚建设而战”^③,两者在价值的层面上并不需要因果关联或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1995年出版的《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把1942年创刊的《女声》杂志界定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进步妇女刊物”。理由如下:该社社长佐俊芝是日本左翼女作家;继任总编辑兼发行者关露是中共党员;该刊以“为妇女而呼声”为宗旨;关露执笔的思想杂谈“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的恋爱观、婚

① 对于田村俊子在中国漂泊谋生时的艰难,周作人在《佐藤女士的事》一文中有所记述:“民国二十八、九年顷她到中国来,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间曾来北京住过些时,我看见她就在那时候。她似乎没有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曾想写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书,却都没有成功,这大抵是民国三十年的事吧。”《佐藤女士的事》,《女声》第4卷第2期(1945年7月15日)。

② 濑户内晴美:《田村俊子》,日本角川书房1983年版,第300页。转引自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③ 《田村俊子作品集月报》第1期,1988年11月。转引自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姻观和家庭观等”；丁景唐、杨志诚等中共地下党员发表的作品“曾深刻地描述了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及下层人民的穷困生活，批判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等等。这些均为后来者的想象，而当时的殖民者和多数读者并不知晓。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事实均无法引向这样的结论：“在佐藤俊子的掩护下，该刊曾被作为上海中共地下党向群众传播进步思想的隐蔽阵地。”^①

李晓红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厦门大学，2007）不是专门的杂志研究，而是从上海女性报刊与知识女性间的互动入手，来梳理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知识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因而，期刊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该文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对日据时期的《女声》杂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该书结论与涂晓华的论文相似。她们都敏锐地提炼出上海民国时期思想史上的一个吊诡现象：男性知识分子扮演对女性启蒙的角色，而女性的声音却只有在男性失语之时才能出现。也就是说，晚清以降，只有在日本完全统治上海的三年多时间里，上海女性的女权主义才得到充分的张扬。不难见出：就像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文学一样^②，沦陷区的中国文化生产和精神生活一直在迂曲地前行，也没有因为殖民统治而造成文化的空白或只有汉奸文化的局面。《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从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互动的层面上有力地证明，长期被打入另册的沦陷区文化，其总量丰富，内涵厚重，是一个亟待重视的研究领域。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沦陷区论述也存在有待完善的方面。

在我看来，李晓红《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一书的描述结构和大胆结论要想令人信服，至少需要首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① 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编：《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② 参见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的几本早期著作，如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E. Gun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等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迺翔、黄万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刘中树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伪满洲国文学》（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一是,在(上海)知识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短短的日本殖民统治期如此丰富和重要?为什么民国时期上海女性主义发展的顶点恰恰发生在沦陷期?

宏观描述类的历史著作应当全面均衡地勾勒出研究对象的基本发展脉络。把原因归结于并非具有普遍性的所谓的男性的失语,有些随意和简单化了。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报刊数量众多。仅以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而论,上海出版的妇女报刊就有50多种。^①李晓红的书只选择了其中的《妇人画报》(1933年4月至1937年7月)和《女子月刊》(1933年3月8日至1937年7月)两种。另一家入选期刊《北斗》(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7月20日)为左联机关文学刊物。由于覆盖的比例太低,难以呈现1930年代媒体、特别是妇女报刊中的女性声音的概貌。相比较而言,由于沦陷期女性报刊的总数要少得多,该书入选沦陷期刊物的比例就远远高于其他时期了。这样,各个时段的刊物抽样率是极为不均衡的,相互间的可比性也就打了折扣。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伊蔚女士任总编辑的《女声》。该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出版了三年多(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5日),抗战胜利后复刊,坚持了两年多(1945年11月至1948年1月1日),跨越两个历史时段,又曾因同名于沦陷期的《女声》而发生间接的纠葛。如果将其引入,无疑会对该书的论题有所充实和丰富。

① 1927至1937年上海出版的妇女报刊有《玲珑》(图画月刊)、《女学生》(月刊)、《上海女子中学校刊》(月刊)、《妇女与家庭》(《大晚报》副刊)、《女星》(月刊)、《德音》、《妇女生活与甜心》(季刊)、《妇女之光》(周刊)、《新妇女》(《中华日报》副刊)、《妇女与家庭》(《东方杂志》专栏)、《女声》(半月刊、月刊)、《妇女月报》、《女朋友》(画报)、《摩登周刊》(画报)、《女子月刊》、《现代妇女》(月刊)、《妇人画报》(半月刊、月刊)、《妇女专刊》(《新闻夜报》副刊)、《妇女园地》(《申报》副刊、周刊)、《上海女子书画会会刊》(年刊)、《现代女性》(月刊)、《中华妇女节制会年刊》、《妇女月报》、《上海女中校刊》、《新女性》(半年刊)、《女神》(图画月刊)、《妇女生活》(月刊、半月刊)、《妇女园地》(《民国日报》副刊)、《妇女专刊》(《申报》副刊)、《上海妇女教育馆专刊》、《伊斯兰妇女杂志》、《女性特写》(月刊)、《舞园》、《妇女文化》(月刊)、《新妇性》(半月刊)、《现代家庭》(《大公报》副刊)、《电影与妇女》(图文周刊)、《妇女与儿童》(《时代日报》副刊)、《妇女与家庭》(《华美晚报》副刊)、《妇女与家庭》(《星夜报》副刊)、《妇女知识》(半月刊、月刊)、《女学生》、《时代家庭》(《时事新报》副刊)、《妇女与家庭》(《大公报》副刊)、《主妇之友》(月刊)等近五十种。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二是,在沦陷期官办妇女刊物与殖民体制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既“共谋”又“疏离”的关系?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又是如何运行的?

统治者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果刊物与殖民统治间的“疏离”居于主导地位,那么,刊物就难以存活下去,在物质载体的层面上形成断层或空白。如果报刊媒体与既存体制之间只有“共谋”,那么,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传统和文化诉求就失却了生存的空间。这是殖民地文化场域的特殊性,是需要详加辩证的。

这看似是在苛求,但却是分析沦陷区官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面向。

认识未知的或知之不多的事物,总要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对于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沦陷区文化(传媒、女性)领域来说,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是该领域宏观、总体研究逐步形成的基础。因此,当前的一些专门的沦陷区期刊研究,如涂晓华的《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就显得十分及时和必要。

这是首篇以《女声》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5),该文以及作者在该文基础上整理发表的系列论文^①,紧紧围绕《女声》展开论述,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日本军国主义者力图通过文化输入与文化构建为其侵略战争的合法性寻找支点,但《女声》的创办非但未能奏效,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日中左翼作家提供了传播先进文化的平台。以共同的“新女性”理念关注女性生活,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思想的介入则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女声》的殖民性。

田村俊子在日本军国主义最嚣张时期的个人选择,具有多重的复杂性。民族、文化和性别身份在田村身上并置,后者成为她晚年展开文化活动的中心点。她在中国传布近代以来的“新女性”独立自主潮流,而非日伪主流刊物中所宣传

① 涂晓华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民族·战争·性别视野中的田村俊子研究——以田村俊子1942—1945上海〈女声〉时代为中心》(黄瑚等主编:《新闻春秋·第九辑: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究讨论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试论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的文化传播》(雷跃捷主编:《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 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上海沦陷时期女性杂志比较——以〈女声〉和〈天地〉为中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

的“贤妻良母”，从而在特定时期给予中国女性以必要的思想启蒙。以《女声》为中介，田村俊子在中国实践了她毕生追求的女性启蒙主义理想——尽管是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实践的。田村俊子在努力挣脱殖民桎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同时又依附于日本当局，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田村俊子的悲哀。

上海沦陷期另一家女性主编的杂志《天地》和《女声》一样，都以追求女性本体意识为宗旨，但《天地》是一份有闲妇女的消闲杂志，而《女声》则是大众妇女的启蒙杂志。在这两份以女性为主导的媒体周围，各自聚集了一批女性作者和读者，在扩展女性话语、开辟女性问题言论空间上，有其各自的功效。

该文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得益于其论述的方式，即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女声》与殖民体制之间的既“共谋”又“疏离”的关系，将研究对象置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中，注重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环境因素或制约条件，如文化体制与报刊市场、编辑人与出资人，以及社团、派别、作者群与读者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开展田野调查，及时采访了一批健在的《女声》关系人员如凌大嵘、蒋锡金、梅娘、（日）林得一、应景襄、沈寂、丁景唐等，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里，获得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历史细节，以及当年《女声》的接受状况。如：

“《女声》杂志总揽大权的是佐藤俊子，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她管理，她出点子”，“佐藤工作时候说自己40多岁，其实她已经57岁”，“《女声》经济情况一直都很紧张、困难”。（凌大嵘）

“《女声》杂志当时我是不看的，我觉得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不要总是强调谁谁是女的，应该平等。所以我对特别的妇女杂志兴趣不大。”（蒋锡金）

“我看到《女声》的第一眼，从排版的字体就明白它是日本人办的杂志，所以不喜欢。”“我们不理解凌大嵘为什么去《女声》杂志工作”。（应景襄）

“当时我有认识的女作家，比如施济美告诉我说她认为《女声》很怪，本来以为是汉奸杂志，但文章其实不错，不是一般的内容，有的还提倡爱国主义”。（沈寂）^①

^① 见涂晓华：《〈女声〉杂志研究——上海沦陷时期妇女杂志个案考察》（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的附录。

这些当年的感觉和判断,对于回到历史现场,至关重要,无疑会有助于在某一局部把握或接近把握特定时代的文化变迁和精神演化的历史。再加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杂志文本”总体研究、杂志中的文本细读,对于解决前文提到的两个问题,前进了一大步。

四、沦陷区报刊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梳理了近十几年来的《女声》杂志个案研究史之后^①,进一步的思考是如何深化沦陷区大众传媒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近代日本占领区生产的文献被人为排除在流通领域之外,各种参考文献目录、馆藏书目或不予收录,或归入另册。^②打破禁忌、填补空白,有待观念的转变。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沦陷区文学研究论著陆续出版,沦陷区文学得到了初步的正面评价,沦陷区报刊专题研究随后也开始起步。

除《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外,以沦陷区大众传媒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还见有《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2005)、《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李相银,华东师范大学,2006)、《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蒋蕾,吉林大学,2009)等。硕士论文除《关露在〈女声〉中的言论研究》外,还见有《隔绝时期隔不断的声音——〈万象〉月刊研究》(高方英,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多重权力制约下的文化与文学图景——〈万象〉研究》(张厉冰,华东师范大学,2005)、《沦陷时期

① 最近的硕士论文《关露在〈女声〉中的言论研究》(王茜妮,辽宁大学,2011),专门对关露在《女声》上用多个笔名发表的130多篇文章作考察,结论与涂晓华的论文相似,即关露在《女声》的积极发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女声》的殖民性,转而成为有益于社会,传播进步之声的园地。

② 例如,《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初版,1980年2版)中的《影片目录(1937.7—1945.9)》规定,上海完全沦陷后“由伪‘中联’和伪‘华影’拍摄的影片,全部不列入本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1833—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的处理方式是:“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凡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期刊,在编辑出版单位前加‘敌’字,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统治时期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在编辑出版单位前加‘伪’字。”